

长久以来，因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论断，《国语》的编纂者长期被归至左丘明名下，甚或认为《国语》乃《左传》撰成后的剩余材料纂辑而成。又因两书记载历史时期相近，每有人称《左传》为“春秋内传”，称《国语》为“春秋外传”。这种定位极大地掩盖了《国语》在文学、史学乃至哲学上的真实价值。作为先秦“语”类书之集大成者，它不仅保留了不同地域文化圈的特征，记载了治国善语善迹，书中所载历史事件及所明之德更是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不断塑造着修身明德的民族性格，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尊周宗鲁以成书

《国语》乃各国史料汇编而成，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一地，故其作者不可确指的观点逐渐获得更多共识。既是史料汇编，可知《国语》中所录文章应是由不同时代各国史官写就的，编者更多只有选材、编排、润色之功，这一点远不同于《左传》等书“作”的性质，也塑造了《国语》一书独有的艺术魅力。

从选材范围来看，《国语》选择了西周、东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有代表性的诸侯国的史料。记载了上至周穆王，下迄鲁悼公，约公元前967年至公元前453年间直接影响中国全局或区域性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从西周晚年周厉王被流放，到周幽王被杀死，从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楚国的盛衰，到春秋末年吴越两国的争霸，无不囊括其中。

从编排结构来看，《国语》创始

《国语》：一部被低估的史学著作

□ 龙 倩

时空并行记言事

中国古代史官历来有所谓记言、记事之分，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但落到具体实践，往往言事难分，事中有言、言中见事。故《国语》虽以着重记言、以国分类为其特色，但作为史书，又必然会遵循一定的历史顺序，体现出“纪事本末法”的特点。因此，在《国语》全书中，以“国别”为表征的空间结构与以“历史进程”为顺序的时间结构，互为补充、相为映衬，呈现出时空双线并行、记言记事相融的特点，反映了作者相当高超的编纂技巧。

《国语》详于记言，而言说离不开事件，故王侯卿士大夫之语都需要特定的叙事框架作为背景。全书叙事框架又呈现出背景、议论、结果三段论式的特点：背景交代事件缘由；议论展示人物言语；结果体现人物言语预测的历史回应，每篇能追一事之终始。以《周语》所载“邵公谏厉王弭谤”为例。事件背景是“厉王虐，国人谤王”，而后邵公进谏，指责周厉王监谤以杀行为的错误性，提出“防

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的核心观点并展开论证，但因厉王一意孤行，最终导致“三年乃流王于彘”的可悲下场。这番时序叙事，使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重民思想更显振聋发聩，时至今日仍在历史的长河上久久回响。

若离开叙事文字，单以议论来看，一番言语又俨然一篇立论明确、逻辑严谨、结构紧凑的说理文。议论的展开又常以宾主问答对话的形式呈现，篇章重点多由答者托出。如《齐语》突出桓公、管仲“明君能臣”的组合，通过“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等一系列桓公亲问、又问的问题，引出管仲“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等强国之道和改革思路。

以记事而言，周、鲁、晋、楚略记一国之事，齐、郑、吴、越则专记一国之一事。如《晋语》共9卷，其中《晋语一》《晋语二》记骊姬之乱，《晋语三》记惠公之行，《晋语四》记重耳流亡，《晋语七》记悼公之功，这几组文章犹如人物专辑，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人物而完成整体故事单元，铺开了晋国的兴亡盛衰史。吴越二语则主要记两国争霸之事，《吴语》讲夫差之兴衰，俨然是一部

《吴王夫差传》；《越语上》以勾践为中心讲如何聚民灭吴，《越语下》以范蠡为中心讲兴越史实。后世《战国策》《春秋后语》等为代表的国别体史书也可看出《国语》的影响。

求多闻善败以监戒

“语”是先秦时一种固定的文体，各种语集为数不少，有《铎氏微》《虞氏春秋》《春秋事语》等。而《国语》可谓是先秦语书之集大成者，在体例完善度、内容丰富度和篇幅数量上均可称最。《楚语上》申叔时在谈到教育太子要使用的9种教材时，除了用到“春秋”“世”“诗”“礼”“乐”等，还明确提到“语”，认为“教之‘语’，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语”，即“治国之善语”，其用便在于明德，以达到“求多闻善败以监戒”的目的。

《国语》所“监戒”首在重民。故论及民神时，先民后神，论及君民时，以民为主。《周语上》记载了内史过综论神、民、君三边关系，认为民神不可偏废，所以当饔公祝史求神赐土地时，内史过说，“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4年后虢国果灭于晋。《鲁语上》则更进一步提出了

“中心图民”及“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国家才能安定有序的宝贵思想。

次在崇德。在《国语》中，德福相应的论调贯穿始终，国君的品德修养，甚至决定着国家的兴亡。国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乃是兴国之征；国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则是亡国之兆。卿士大夫乃至普通个人之德亦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在“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夫德，福之基也”“忧德不忧贫”“忠信而本固”思想的助推下，忠、信、仁、义、智、勇、孝、惠等美德不断强化，在代际传递中积淀为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向往和追求。

再在用贤。一部《国语》，客观上展现了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礼崩乐坏史。大国相争，孰能争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君能否用贤。《齐语》在全面总结概括桓公征伐强暴、扶助弱小、捍卫中原的功绩后，于文末点出用贤的至关重要性：“唯能用管夷吾、宁戚、鬲粥、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吴、越二语也着重分析了吴从胜利走向失败，而越能够在失败中奋起，“苦心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最终给中华民族树下无畏失败和苦难的精神丰碑的原因。



《金人铭》修身立世哲理的碑文中的

□ 封 斌

铜人的嘴巴被封了三层，而背上有这样的铭文：这是古时审慎说话的人，以此为戒！接着，碑文说“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意思是说，不要多说话，多说话就有可能多过失；不要多生事，多生事就有可能多祸患。所以古人才讲“是非只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对此，碑文以“曰是何伤？祸之门也”点睛。作为一个文武兼备、深谋远虑的国之重臣，周公对儿子伯禽的嘱托以谨言慎行开篇，足以可见言行修养对个人修身立德的重要影响。在孔子看来，在多听的基础上广泛了解，对于那些有疑惑的地方暂且搁置起来；即使是谈论确定无疑的事情，也要谨慎地说出，这样就减少过失。在多看的基础上广泛观察，对于那些察觉有危险的事情暂且搁置起来；即便做那些安全无害的事情，也要谨慎地去做。

应该说，对于言行修养的重视贯穿儒家修身路径的全过程，“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为官从政者的行为对百姓具有示范引领作用，这就更加要求为官从政者谨言慎行，少说空话、力行实干。

居安思危

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覆亡的原因有很多，安逸享乐、放松警惕往往就是其中之一。碑文说“安乐必戒，无所行悔”，这是指安逸快乐的时候一定要警戒，不做任何使自己后悔的事情。殷鉴不远，周公认真反思商朝覆亡的历史教训，牢记商纣王在酒池肉林奢靡安乐中丧失民心的反面教材，鲜明提出戒除安乐、居安思危的观点，不去做那些让自己后悔的愚蠢行为。有的从政者沉迷安乐，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毫无洞察力，对可能扩大的隐藏风险毫无戒备心。为此，碑文说“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勿谓不闻，将祸何人。焯焯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这一段采用说理与举例相结合的方式，力陈奢靡安乐对于一个国家的破坏性影响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人们防微杜渐。不要以奢靡安乐没有什么妨害，这个祸患的持续时间将会很长、破坏性会很大、影响面会很广。就像小火不及时处理，大火就更难扑灭；小溪不及时阻塞，最终会汇成河流；细丝不及时斩断，最终会织成罗网；小苗不及时拔，将来只能借助斧头来清理。《周易·系辞下》中说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韩非子》中讲“千丈之堤，以蟻蚁之穴溃”，诸如此类名言用典，都在历陈居安思危的辩证之理。

谨言慎行

《金人铭》碑不仅记载了周公对儿子伯禽的谆谆教导，还描述了当年孔子来到太庙，观看《金人铭》的情境。碑文伊始便讲：“孔子观周，入后殿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意思是说，孔子到宗周参观，在后殿中看到庙堂右边台阶前立有一个铜人，

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其生存发展的威胁，不仅仅是那些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或灾难，有时候那些不易察觉、缓慢积累起来的倦怠与松懈往往更具破坏力。所以，当政者即使身处顺境也要有忧患意识，对于潜在风险要时刻保持警惕，及时处理。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临深履薄，如此才能安身保国。

不耻下问

伯禽初入鲁国，对于鲁国当时的风土人情和政治生态并不十分清楚，尤其当时适逢武庚叛乱结束，鲁国仍然面临着清除残余敌人和维护西周政权的重要任务。因此，周公叮嘱伯禽一定要在待人接物上谦虚恭敬、与人为善，切不要逞强好胜、四面树敌。碑文中说“内藏我智，不示人技”，尝试着先韬光养晦、以待来日。当然，除了韬光养晦之外，更重要的是以谦恭姿态求教于人，不耻下问。碑文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这是说君子知道不能位居天下人之上，因此甘居人下；知道自己不能位列天下人之前，所以虚心在后。温和恭敬，谨慎修德，使别人倾慕自己的品德；示弱处下，没有人与自己相争。江海虽然是位居东边，但却是百川之长，正是由于地势较低的原因。天道行事没有偏爱，还能谦逊对人。

《论语·述而》提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尚书·大禹谟》讲“满招损，谦受益”。谦虚求学、与人为善、低调内敛、不耻下问一直是传统文化倡导的优秀学习态度。今天，这种虚怀若谷的格局胸怀和谦恭有礼的品德修养仍然是我们需要念兹在兹、久久为功的努力方向。

岁月无声，唯石能言。《金人铭》作为周公诫子箴言，被称为古代家训的典范。就任鲁君后，伯禽谨记父亲教诲，励精图治40余年。伯禽也因感念服膺于父亲周公的德治教化，遂在曲阜县城北筑高台望故土，史称“伯禽望父台”。千年之后，当我们驻足曲阜周公庙《金人铭》碑前，品读这段俊朗而有韵味的文字，周公修身教子的拳拳之心和智慧言语依然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上接1版）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行动指南。新时代新征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把握大势，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明确了“七个着力”的任务要求；明确了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的目标要求。这些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明确了路线图、任务书。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遵循。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文化在其中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鉴往知来，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新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系，阐明了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重要遵循。

从新时代文化建设中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强大伟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前进速度和更加壮丽的未来。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制定《中国

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重拳整治网络生态乱象，压紧压实属地管理和主管主办责任。意识形态领域从被动到主动，主基调自信自强、大环境清新清明、总态势向上向好。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历史担当，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项历史性工程、战略性工程来抓。无论是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程等重大工程深入实施；无论是《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出版，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国家版本馆等文化殿堂相继落成，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推动下，中华文化的“一池春水”生机勃勃。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自信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全面推进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中国人民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结合”，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以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构筑起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高潮。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必须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在学习宣传上体现行动。在全面、系统、深入学习上下功夫，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引导全社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第二批主题教育重点安排，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会，组织开展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研讨等活动，推动走深

走实、入脑入心。在通俗化大众化上勇创新。组织媒体开辟专题专栏，推出一批接地气的新闻力作和融媒体产品，用好各级文化文艺阵地，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惠民演出、群众文化生活，推动传遍三湘大地、温润千家万户。

在研究阐释上贡献智慧。体系化学理化是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也是研究阐释的重要任务和基本路径。强化学理支撑，统筹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发挥社科基金、马工程引导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重点研究和攻关，深入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依据、现实基础、发展脉络，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为推动这一重要思想的学习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贡献智慧力量。坚持实践导向，以研究解决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为基点，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总结研究，用这一重要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中彰显更大作为。

在贯彻落实上探索路径。理论作用发挥的效度取决于理论见诸实践的深度。切实把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化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思想武器，贯彻落实到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转化为推动宣传思想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坚决落实首要政治任务，提升文化铸魂力。着力健全“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湘江大讲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会等各有侧重又相互贯通的学习体系，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地生根、深入人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引领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深化“我的韶山行”研学活动，推进全域全员全程全面文明创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升文化传魂力。统筹内宣外宣、网上网下，开展丰富多彩的形势宣传、政策宣传、主题宣传、典型宣传，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完善工作机制精准引导舆论，当好改革发展的“推进器”、舆论引导的“定音鼓”。实施文物保护利用“六大工程”，积极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加强历史街区、古老建筑和古村落保护，深化新时代湖湘文艺精品创作工程。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和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 and 转型升级，深化“一企一方案”国有企业改革，建强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引导管理，提升文化保障力。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坚决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向上向好态势。

（作者系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